

屈原楚辞注

刘让言 编注



•3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屈原楚辞注

刘让言 编注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屈原楚辞注

刘让言 编注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排版

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180千字

1982年3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112 定价：0.68元

前 言

屈原名平，公元前三四〇年（楚宣王30年）左右出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。他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的伟大诗人。

屈原生活的年代，正是我国历史上急剧变化的战国后期。这时，经过春秋和战国初期的长期动荡，我国已基本上由奴隶制进入了封建社会。各国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，进一步统一中国，进行着长期的战争；各国内部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而实行的改革，遭到旧贵族势力的阻挠和破坏，进步力量和保守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，也在不断地进行。楚国这时正处在严重的危机时期，外部受着西部强秦的威胁，内部新旧力量的斗争也异常激烈。就楚国当时的情况来说，对外能否实行正确的外交路线，对内能否进行彻底的改革，是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。

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，和楚王同宗，幼年时有机会受到完好的教育，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说他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。大约在公元前三一八年（楚怀王11年），他作了楚国的左徒，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，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”，很得楚怀王的信任。屈原在任左徒期间，对外联齐抗秦，贯彻“合纵”政策，公元前三一八年他曾为楚国“东使于

齐，以结强党”，这年六国联合攻秦，楚怀王为“纵长”，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。他对内进行改革。他的政治理想是“举贤授能”，修明法制，使政治清明，国家富强，人民生活安乐。他在《惜往日》这篇诗中描述那时的情形说：

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诏以昭时。

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

国富强而法立兮，属贞臣而日媿。

秘密事之载心兮，虽过失犹弗治。

可见在楚怀王的信任下，当时他的政治改革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。如果屈原的理想能够实现，楚国一定会富强起来，楚国的前途也一定是光明的。

可是，屈原的改革由于触犯了楚国旧贵族集团的利益，因而遭到他们疯狂的阻挠和破坏；屈原也成为他们嫉恨和陷害的目标。于是公元前三一三年（楚怀王16年），奸佞上官大夫因夺宪令草稿未遂，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，怀王一怒之下，就疏远了屈原，除去他的左徒职位，让他作掌管屈、昭、景王族三姓宗事和管教王族子弟的闲官三闾大夫。“世溷浊而嫉贤兮，好蔽美而称恶”（《离骚》）；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齌怒”（《离骚》）；“竭忠诚以事君兮，反离群而赘疣”（《惜诵》）；可能就是指他被谗见疏的事而言。

就在这时，秦国派遣张仪到楚国来，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令楚与齐绝交。这明明是个骗局，可是昏聩无能、目光短浅的楚怀王，不听忠臣陈轸的劝告（这时屈原被疏，不复在位），结果

与齐绝交，六百里的土地也没有得到。楚怀王受骗之后，恼羞成怒，于公元前三一二年（楚怀王17年），举兵伐秦，战于丹、淅。结果楚国大败，被秦军“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”，秦取得楚之汉中地。怀王又尽发国中兵，第二次伐秦，战于兰田，结果楚又惨败。这时“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，以至于此，于是复用屈原”（刘向：《新序·节士篇》）。《国殇》大概就是在这两次大战之间写成的，是为悼念大将军屈匄和阵亡战士而作，诗中充满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。

公元前三一一年（楚怀王18年），屈原第二次出使齐国，和齐国恢复联盟。秦国急忙又派张仪到楚国进行拉拢和破坏。张仪到了楚国，说秦愿割汉中地之半于楚，与楚和好。怀王本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杀之，于是就把张仪囚禁起来。后来，张仪贿赂近臣靳尚，勾结怀王宠姬郑袖，怀王终于听信了这些亲秦投降派的话，结果把张仪放走了，并且背叛纵约，“与秦合亲，约婚姻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。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，问怀王为何不杀张仪，怀王后悔了，派人追赶张仪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在此后的四五年中，楚虽一度放弃了亲秦政策，与齐联合，但是屈原并未被用，政权仍掌握在那帮亲秦派小人的手中。

公元前三〇五年（楚怀王24年），秦昭王初立，又来拉拢楚国，于是楚又背齐合秦，旧贵族亲秦派再度得势，屈原的联齐抗秦政策又遭到严重的打击。屈原竭力反对这种投降政策，可是，楚怀王不但不听，反而把屈原赶出郢都，放逐到汉北。这次流放大约有五年的时间，《抽思》和著名的长诗《离骚》，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。诗中抒写了诗人流放汉北时的孤独、忧伤和“瞻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”的心情，以及他对楚国贵族集团的奸邪谄谀和楚怀王听信谗言、昏庸误国的愤恨和谴责。

亲秦派的背齐合秦，原是只图一时的苟安，并非长远之计。秦国是必欲把楚国吞掉才甘心的。公元前三〇一年（楚怀王28年），秦国联合齐、韩、魏攻楚，杀楚将唐昧；第二年秦又攻楚，楚军死者二万，杀楚将军景缺。这时楚怀王害怕起来，于是又把屈原从汉北召回，让他带着太子作人质，再一次到齐国去复交。公元前二九九年（楚怀王30年），秦又伐楚，夺取楚国八个城市，胁迫怀王在武关（今陕西商县东）会盟。这又是秦昭王的一个诡计。屈原和昭睢都竭力劝阻。屈原谏怀王说：“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）可是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极力劝说怀王前往。怀王进入武关，就被秦国扣留起来。公元前二九六年（楚顷襄王3年），楚怀王死于秦国。

当怀王被扣留在秦国的时候，楚国大臣们把太子横从齐国迎回，立为楚王，就是顷襄王。这时子兰作了楚国的令尹。怀王的死在楚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楚国人民把对怀王的哀悼，同对秦国的仇恨，以及对楚国贵族统治集团的无能误国而产生的愤怒结合起来。所以当秦国把怀王的灵柩运到楚国的时候，“楚人皆怜之，如悲亲戚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。人们自然要埋怨子兰，因为他竭力劝怀王去秦国的。屈原那时的悲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，他对子兰也不能没有怨言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说：“屈原既嫉之，……令尹子兰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。”于是，屈原第二次又被放逐，这次流放的地点是江南湘西一带的寂寥的荒野。《思美人》和《涉江》记述了诗人这次流放时的心情和行程。诗人在流放出发前后，写下了他悼念怀王和悲叹楚国命运的诗篇《招魂》。这次放逐是长期的，直到诗人之死。《天问》是屈原长期流放江南时期而写的又一篇长诗。

公元前二七八年（楚顷襄王21年），秦将白起攻陷了楚国的郢

都，把楚王祖先的陵园也烧毁了。白起描述当时楚国的形势说：

“是时楚王恃其国大，不恤其政，而群臣相妒以功，谄谀用事，良臣斥疏，百姓心离，城池不修，既无良臣，又无守备。”

（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）这样腐败的国家，当然是无法抵御秦军的侵略的。因此，当郢都陷落之后，顷襄王就带着一帮庸俗无能的朝臣逃到陈城（今河南淮阳县）。可能就在郢都危急的时候，屈原又回到那里，想为祖国出力，但仍遭到旧贵族集团的排斥，所以在郢都陷落时，他又和百姓一起逃亡。《哀郢》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，它记述了诗人同百姓一起逃亡时的实际情形。

屈原这次流亡，是从郢都顺着江夏东流，先到夏口。他是“放逐之臣”，必须再回到他的放逐地去，于是他再由夏口溯江而上入湖、湘。可是他没有再溯沅水而上到湘西的辰阳、溆浦，他决定到长沙去。

诗人是怀着以死殉国的决心去长沙的。长期的放逐生活，使诗人的身心受尽了摧残和折磨，怀抱的政治理想既不得实现，郢都的陷落又给他精神上以重大的打击；他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无法挽救，在极度地悲愤和痛苦的心情下，随萌以死殉国的决心。“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。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兮”，这是他决定赴死的誓言。这时屈原写了《怀沙》，“怀沙”是怀念长沙的意思。长沙是楚的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，“而归死先王故居，则亦首邱之意”（蒋骥：《山带阁注楚辞》）。屈原在长沙停留了一个时期，写了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，于第二年，即公元前二七七年（顷襄王22年）的五月五日，自投汨罗而死，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。

屈原的一生是同旧贵族集团、亲秦派斗争的一生，政治上他是失败了，但是他的战斗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崇高人格，却在他留

下的诗篇里永放光辉。

二

屈原的诗歌后人叫做“楚辞”。这是西汉人给予它的名称。

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说，严助曾把朱买臣推荐给汉武帝，“召见说《春秋》，言‘楚辞’，帝甚悦之”。《汉书·王褒传》说：

“宣帝时，修武帝故事，讲论六艺群书，博尽奇异之好。征能为‘楚辞’九江被公，召见诵读。”可见在西汉初年，“楚辞”已和《春秋》六艺等并论，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，出现了研究这门学问的专门人才。到了西汉成帝时，刘向把屈原、宋玉以及西汉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等人的楚辞作品编成《楚辞》一书，从此才有了“楚辞”的总集。

“楚辞”是从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诗体。本来意思就是楚人的歌词。作为一种诗歌体裁来说，“楚辞”是有其显著的特点的。宋人黄伯思说：“盖屈、宋诸骚，皆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谓之‘楚辞’。若些、只、羌、诃、蹇、纷、侘傺者，楚语也；顿挫悲壮，或韵或否者，楚声也；湘、沅、江、澧、修门、夏首者，楚地也；兰、茝、荃、药、蕙、若、蘋、蘼者，楚物也。”（见《宋文鉴·新校楚辞序》）

“楚辞”是一种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，有独特风格的诗歌形式。

“楚辞”汉代人又叫做“赋”，在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《诗赋略》里，屈原的作品就称为《屈原赋》。刘勰说：“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诠赋篇》）“楚辞”多用铺叙的手法，特别象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招魂》等一些长篇，对“汉赋”的形成是有直接的影响的。但是，

用方言口语而抒情写志的“楚辞”，与堆砌辞藻、“铺采摘文”的“汉赋”是很不相同的。严格地说来，“楚辞”是真正的诗，而“汉赋”则是有韵的散文。

屈原是“楚辞”的创造者，也是“楚辞”最重要的作家。从屈原的一些作品如《橘颂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天问》等篇中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受《诗经》三百篇的影响。但是，对屈原创造“楚辞”影响更大、更为直接的，则是楚地的民歌。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记载，禹巡行到南方去，涂山氏女在涂山之阳等候他，作歌曰：“候人兮猗！”可见，楚地民歌的渊源是很古远的。到了西周时期，楚地的民歌更有所发展，在《诗经》的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，就有江、汉流域的民歌，如《汉广》、《江有汜》等。稍晚，在公元前七世纪，有《子文歌》（见《说苑·至公篇》）、《楚人歌》（见《说苑·正谏篇》）等的出现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中叶，楚国出现了一首根据越人口唱而翻译的《越人歌》（见《说苑·善说篇》）。歌词说：

今夕何夕兮，搴舟中流？
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？
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诟耻。
心几顽而不绝兮，得知王子。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
心悦君兮君不知！

据说这是楚康王的弟弟鄂君子皙的一段故事。鄂君子皙驾舟出游，操舟的可能是个越国的船娘，她唱了这首歌。鄂君子皙不懂越语，就使人把它用楚语翻译了出来。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、五

世纪初，楚国又出现了《楚狂接舆歌》（见《论语·微子篇》）和《沧浪之水歌》（见《孟子·离娄篇上》）。后面一首的歌词说：

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
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

这些民歌，无论就思想意境或表现形式来说，都说明了楚地民歌已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。楚国是一个巫术盛行的国度，他们在祭祀鬼神时，“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”（王逸：《楚辞章句》），因此楚地的祭神乐歌是很丰富的，这也给屈原创造“楚辞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屈原的《九歌》就是直接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，经过提炼、加工而创作出来的。

屈原继承和发展了《诗经》的优良传统，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，创造了“楚辞”这一新的诗体，把我国诗歌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

屈原的作品，根据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记载是二十五篇。这二十五篇都保存在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里。王逸认定是屈原的作品的，有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（十一篇）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（九篇）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二十五篇。篇数虽然与《艺文志》的说法相合，但实不足信。比如《招魂》一篇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明明说是屈原的作品，而王逸却说是宋玉作；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是后人记述和编写的有关屈原的故事；《远游》一篇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来看，都不可能是屈原的作品。关于屈原作品的篇目问题，从汉代起到现代，曾有过各种不同的争论，直到目前，也还不能求得一

个统一的认识。但是，根据多数研究者的意见，现在可以定为屈原的作品的，有《九歌》（十一篇），《离骚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天问》和《九章》（九篇），共二十三篇。

关于屈原作品写作的确切年代，由于没有详实的史料记载，也是长期争论而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根据诗歌的具体内容，结合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记载，关于屈原现存各篇诗歌的产生年代，可以得到一个大体上的认识。《九歌》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曲和神话传说，为楚宫廷演唱而创作的一组祭神乐歌，它是屈原的早期作品，可能是他在任左徒期间（公元前318年——前313年，楚怀王11年——16年）受怀王之命而写作的。

《九歌》指《东皇太一》、《东君》、《云中君》、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大司命》、《少司命》、《河伯》、《山鬼》九篇祭神乐章而言，《礼魂》是歌舞的尾声。编在《九歌》里的《国殇》，是屈原为追悼丹、淅之战楚国阵亡将士，特别为悼念大将军屈匄而作，应当是写于公元前三一二年（楚怀王17年）。

《离骚》作于诗人流放汉北时期（公元前305年——前300年，楚怀王24年——29年）。《招魂》是公元前二九六年（楚顷襄王3年）为哀悼楚怀王之死而作。《天问》是诗人长期流放江南期间（公元前296年——前277年，楚顷襄王3年——22年）断断续续写成的。

《九章》的九篇作品，班固、王逸都说是屈原放逐江南以后所作，这话并不确切。朱熹说：《九章》“非必出于一时之言”

（《楚辞集注》），这话倒是符合实际的。根据近人的研究，大都认为《橘颂》是诗人青年时期的作品，可能作于出任左徒（公元前318年，楚怀王11年）以前；《惜诵》作于遭谗被疏的初期，大约在公元前三一三年（楚怀王16年）；《抽思》作于流放汉北时期，与《离骚》是同时期前后的作品。《思美人》应当是公元

前二九六年（楚顷襄王3年），诗人流放江南的途中所作。其余五篇都作于流放江南以后。这五篇作品，《涉江》记述了诗人渡江南下的行程，放逐时的悲愤心情，以及放逐生活的孤寂和凄凉，当是流放初期的作品。《哀郢》是哀叹郢都的陷落，应作於公元前二七八年（楚顷襄王21年），因为楚的郢都是这年被秦将白起攻陷的。《怀沙》、《惜往日》和《悲回风》三篇，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多，现在略加叙述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说：“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……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。”后来很多屈原的研究者，根据这话作出推断，说《怀沙》是屈原的绝笔（作者也附和过这种意见）。这样一来，就使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两篇作品的写作年代，无所系属，于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朱熹在《楚辞集注》里，认为《惜往日》、《悲回风》是屈原的“临绝之音”，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，可是他又认为《怀沙》是“言怀抱沙石，以自沈也”。因此，他也是主张《怀沙》是屈原的绝笔。主张《怀沙》是屈原的绝笔，就必然认为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作于《怀沙》之前。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屈原作品的实际的。蒋骥在《山带阁注楚辞》中，根据明人李陈玉的解释，认为“怀沙”是“寓怀长沙”的意思，反对把“怀沙”解释为“怀抱沙石”，因而他对《怀沙》是屈原的绝笔，提出不同的看法。他明确地指出，《怀沙》之名，与《哀郢》、《涉江》同义；沙本地名，即今之长沙，是汨罗之所在。他说：“怀沙者，盖寓怀其地，欲往而死焉。”他并把《怀沙》、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都系于《哀郢》之下，认为“《怀沙》则决计一死矣，《悲回风》欲死而未忍遽死，《惜往日》则毕辞而死矣。”他是把《惜往日》作为诗人的绝笔的。这些意见，按诸史实，玩之诗意，都是更为合

理的。

顷襄王时屈原流放江南的地点，是湘西沅水流域辰阳、溆浦一带的山野，这从《思美人》、《涉江》的记述中可以看出。公元前二七八年（楚顷襄王21年）春，在郢都陷落之前，屈原曾从放逐地回到郢都；郢都陷落之后，在仲春（夏历二月）的一个早晨，他和百姓们一起沿着江夏向东逃亡。他先到夏首（即夏口），然后和逃亡百姓们分手，回到他被流放的湘西去，于是又溯江西浮入洞庭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秦昭襄王二十七年（公元前280年），“使司马错发陇西，因蜀攻楚黔中（在今湖南沅陵县西），拔之”。又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，楚顷襄王二十年（公元前279年），“秦将白起拔我西陵（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）”。因此，在公元前二七八年郢都陷落以后，湘西一带已全在秦军控制之下，这时屈原要想回到放逐之地，实际上已不大可能。屈原是“放逐之臣”，随楚王逃往陈城，当然是不会被允许的，重回放逐之地又不可能，他究竟该到何处去呢？他完全陷入迷茫困惑之中。《哀郢》中写道：“发郢都而去间兮，怊荒忽其焉极”；“心婵媛而伤怀兮，眇不知其所蹊”；“凌阳侯之泛滥兮，忽翱翔之焉薄”；“当陵阳之焉至兮，淼南渡之焉如”。这些诗句，都是他徘徊不定的心情的真实描写。于是他想起了长沙，他决定到长沙去，因为长沙是他的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，他决定要死在那里。诗人在“草木莽莽”的“孟夏”（夏历四月）时节，南下往长沙，《怀沙》大约是在去长沙的中途写成的。诗中写道：

曾伤爰哀，永叹喟兮。

世溷浊莫吾知，人心不可谓兮！

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。

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兮。

他在极度地悲愤、痛苦和失望的心情下，决心以死殉国了。

诗人在长沙暂时停留下来，他希望顷襄王能够觉悟，希望楚国的命运能够好转。这年的秋冬之季，诗人写下了那篇充满忧伤、哀愁和凄苦的情调的抒情诗《悲回风》。蒋骥说：《悲回风》是屈原继《怀沙》而作，是他毕辞投渊前“隔年之秋”的作品，这个推断是合理的。诗中说：

孤子吟而抆泪兮，放子出而不还。

孰能思而不隐兮，照彭咸之所闻。

屈原哀叹自己的不幸遭遇，看到自己的命运与投水而死的彭咸相类；“凌大波而流风兮，托彭咸之所居”，这时他只有象彭咸那样去投水而死了。“浮江淮而入海兮，从子胥而自适”，他要象传说中的伍子胥那样，随波而去。可是，“望大河之洲渚兮，悲申徒之抗迹。骤谏君而不听兮，重任石之何益！”他又想到殷朝的贤臣申徒狄，因谏纣王不听，负石投水而死，而结果殷朝还是灭亡了。因而他想到自己屡屡劝谏楚王而不被听从，自己就是抱石投渊而死，又会有什么用处呢？这里真实地写出了诗人“欲死而未忍遽死”的矛盾心情。到了第二年（公元前277年，楚顷襄王22年）春，秦国蜀中太守张若“伐楚，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”

（《史记·秦本记》），屈原放逐之地的辰阳、溆浦一带也被秦军占领了。国土日蹙，昏君又不悟，诗人对祖国的前途绝望了，在极度的悲伤、痛苦和绝望中，他写了沉痛的绝命辞《惜往日》，

“宁溘死而流亡兮，恐祸殃之有再”，他宁愿马上投水死去，而不愿复遭亡国之祸，使自身再次受辱。“临沅湘之玄渊兮，遂自忍而沉流”，“不毕辞而赴渊兮，惜壅君之不识”。于是，诗人就在这年的五月五日，“不毕辞”而投水自杀了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大致确定，屈原现存的作品有二十三篇，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，大体是这样：《橘颂》、《九歌》（组诗，包括《礼魂》共十篇）、《国殇》、《惜诵》、《抽思》、《离骚》、《招魂》、《思美人》、《涉江》、《天问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怀沙》、《悲回风》和《惜往日》。屈原为楚国和楚国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精神，他所遭受的残酷的迫害和不幸，他的进步的政治理想，以及他那光明磊落的、崇高的和坚贞不屈的人格，都具体、生动地反映在他那光辉而不朽的诗篇里。屈原在政治上是失败者，但他却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。

三

屈原对我国诗歌发展是有重大的贡献的。他的诗歌无论就内容和形式来说，比起《诗经》来，都有显著的发展。他深化了诗的内容，想象丰富，感情奔放，构思奇特，语言生动瑰丽，在他的诗里大量采用了神话传说的素材，形式多样而富于变化。所有这些，都给我我国诗歌的发展，带来了积极的有利的因素。

屈原诗歌的最显著的特色之一，是它的现实性和真实性。他的诗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楚国社会的尖锐矛盾——贵族集团的内部斗争，政治的腐朽和黑暗，国家命运的危殆和人民生活的困苦，反映了楚国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。在屈原的诗歌里，通过诗

人亲身的遭遇和感受，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坚持真理、热爱祖国、同情人民的刚正不阿的抒情诗人的高大形象。因此，屈原的诗歌是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的，它是《诗经》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有些屈原研究者，惯于把屈原称作浪漫主义的诗人，这是不太符合屈原作品的实际的。屈原的有些作品，由于采用了神话传说的题材（如《九歌》），或者用了想象和幻想的表现手法（如《离骚》、《招魂》等诗篇中的某些部分），显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；但从屈原诗歌的基本精神和总的倾向来看，是现实主义的。郭沫若曾说：“屈原，基本上是一位现实主义者。”

（《屈原赋今译》）这话是对的。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它的现实性和真实性，是通过现实的真实描写，反映事物和生活的本质和规律。屈原的作品是符合现实主义的这一基本精神的。

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诗人，他的诗歌同他的政治理想以及他为祖国前途、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，有着血肉的联系。屈原的政治理想是通过贤明的君主，施行开明政治，举贤授能，明法审令，使国家富强，人民生活安乐。这种理想有着法家的积极因素，但基本上是儒家的思想，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，但它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的利益，是有其进步的、积极的意义的。屈原在诗中一再表达他的政治思想，他称赞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的功德。他在《离骚》中说：

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；
何桀纣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径以窘步！

又说：

汤禹俨而祗敬兮，周论道而莫差；
举贤而授能兮，循绳墨而不颇。